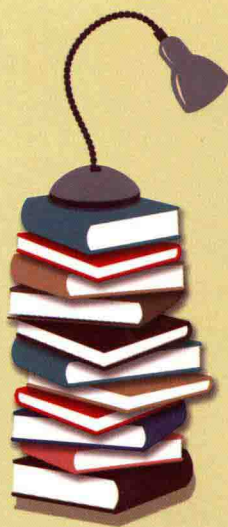




中国思想史纲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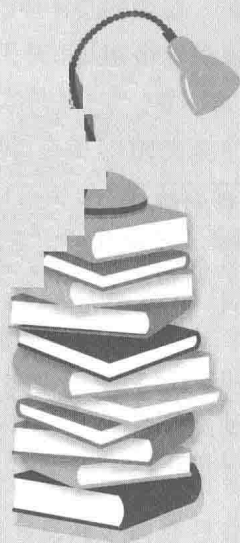
主 编◎袁名泽
副主编◎冯 莹 曾凡贞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

中国思想史纲要

主 编◎袁名泽
副主编◎冯 莹 曾凡贞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思想史纲要 / 袁名泽主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2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
ISBN 978-7-5643-5285-1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思想史 - 中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7700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

中国思想史纲要

主编 袁名泽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助理编辑 左凌涛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张 18.75
字数 455 千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43-5285-1
定 价 45.00 元

课件咨询电话: 028-87600533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历史是事物发展的过程，其本身是客观的，人们研究历史，尽管要求尽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但无论如何，其成果总是主观的。如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总不相同，对思想史研究而言，每个人的《中国思想史》也各具特色。编者发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大多显得比较陈旧，大多数成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出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的书稿只有2004年罗林的《中国思想史讲授篇》，2006年出版了方旭东的《中国思想史讲稿》和曾长秋的《中国思想史论纲》。除此之外，还存在的一些版本普遍存在卷数宏厚、字数较多、费用较高等问题。例如，韦政通的一套有两册，张岂之的（2012年版）一套两册，葛兆光的一套三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一套两册，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思想史十讲》一套两册。值得注意的是，王锐的《中国思想史论稿》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精简且较新，但较之林林总总的思想史巨著，精简的相关读本仍显单薄。所以，编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编写一本精简全面的《中国思想史》。

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认为，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决定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因为有什么对象，才可能有什么内容，思想史的对象就是我国思想发展的过程。但因我国思想史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大，内容丰富，所以写作起来绝非易事。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思路编著这本书，因为我们稍不注意就会写成像葛兆光、韦政通、张岂之、李泽厚、侯外庐等大家级人物的《中国思想史》。而我们确定的写作原则要求我们只能写成类似于罗林、吴臻、曾长秋、方旭东、刘兴华、王锐等人的精简本。同时，我们的写作目的要求我们也不能写得太简练，只能写成类似于邵军的《中国思想史》，否则读者就不能系统掌握我国思想史的脉络和内涵，因此将此书命名为《中国思想史纲要》。确定本书写作原则之后，继而又遇到确定本书的历史分期这一棘手的问题，它关乎本书的内容编排与字数多少，如分期不妙，则很可能导致长篇宏论。经过本书编写组所有成员的集体协商，最后决定该书的写作重点在于梳耙原始社会与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两汉、隋唐、两宋、元明、鸦片战争前的明末清朝、近现代中国等时期的思想体系。

在梳耙每个时期的思想体系时，我们遵从了侯外庐老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强调思想史和社会史不可分割的治史方法，将思想史看成整个人类社会史的一部分。所以，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当家作主的观念，既概括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又具体分析每个时代的个人日常观念，即以社会思潮为经，个人思想为纬行文。不管是概括社会思潮，

还是分析个人的思想体系，我们都注意阐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当然，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社会思想和个人日常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所以，从原则上来说，社会思潮是指理论化的思想，即精英思想。而个人日常观念肯定包括精英思想，但又限于精英思想，它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观念。基于此，本书写作过程中又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阐释普通群众的日常观念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广大群众的日常观念一个个阐释，本书只能采取分析普通群众普遍关注的诸如科技和信仰等思想问题的方法去阐释，因而本书对每个时代的科技思想和宗教思想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因科技思想和宗教思想本身也包括科技界和宗教界的精英思想，所以在阐释过程中又出现了普通群众的日常观念与精英思想交叉之处。

基于以上的编写规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虽然也随处可见“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等概念，但本书在处理思想史研究对象时却淡化了这些意识形态成分，着重于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理论、价值观”等文化核心内容，只要是属于这些方面的内容，编写组均尽力收集。本书还力图从历史材料出发，恢复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思想家、思想著作、思想体系等对象间的相互关系的本来面貌，尽力减少本书对以上内容介绍的主观性。所以本书的具体内容是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对社会思潮、思想家、思想著作、思想体系的产生背景、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历史影响进行兼具理性和客观性的研究和阐释。当然，编者虽然力求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范畴、术语做准确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解释，但它毕竟是编者按自己的意图编成的，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编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为了和《中国哲学史》区别开来，本书的内容除了介绍历史上的哲学思潮和每个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外，还分别介绍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史学思想、科技思想等）、宗教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天主教思想等）、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内容。对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介绍也重在以上思想的分别介绍。

从框架上来看，本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古代传说与原始社会的宗教思想及甲骨文、钟鼎文中所体现的夏商思想；第二章首先概述西周的人文思想和春秋前期《周易》的辩证法思想，接着分别介绍春秋时期老子、孔子和管子的思想、战国时期诸子思想、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突起与百家争鸣的结束；第三章首先介绍西汉黄老遗风，接着介绍两汉经学和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最后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与反玄学之争及东汉时期佛道等宗教发展趋势和神灭论之争；第四章主要介绍隋唐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自然科学思想、史学思想以及此时期的反佛道思想体系；第五章所说的两宋，它是我国思想十分兴盛的时期，此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有王安石的新学、道学、张载关学、心学及功利主义的反道学思想、佛道思想；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元明两代时深陷危机的道学思想、陆王心学、泰州学派、东林和复社等学派的思想体系，还介绍了此时的西学、科学和宗教思想；第

七章主要介绍鸦片战争前的明末清初时的方以智、王夫之的思想以及道学危机的深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反道学思想家们的思想、功利主义思想的复兴、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和内涵、戴震思想及其影响以及此时期比较繁荣的史学思想；第八章分别介绍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太平天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思潮、洋务运动的改革思潮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戊戌变法时的社会思潮、严复对西学的推介及其与旧学的较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

所以，思想史的编写和学习最重要的是要理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因素，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也要注意运用文字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知识和技能去收集和整理相关史料，去阅读一定数量的思想文化经典；最后，我们还应该树立一种将社会史与思想史、学术史紧密结合的观念，还需阅读和借鉴一定的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知识，只有这样，我们编写和学习中国思想史才能做到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才能真正做到“通”史。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与夏商时期的思想	1
第一节 古代传说与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思想	1
第二节 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的夏商思想	4
第二章 西周与春秋战国的诸子思想	10
第一节 西周时期的思想体系	10
第二节 春秋前期《周易》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13
第三节 春秋时期老子、孔子、管子的思想	15
第四节 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精髓分述	27
第五节 法家兴起与诸子百家争鸣结束	48
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思想体系	56
第一节 西汉初期的黄老遗风	56
第二节 两汉官方经学思想	62
第三节 两汉唯物主义思想	70
第四节 魏晋玄学和反玄学	89
第五节 汉末佛道思想流布与神灭论思想的对峙	94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思想体系	111
第一节 佛学的兴起与分化	111
第二节 道教哲学的演化	120
第三节 自然科学、史学及其他反佛道者的思想体系	127
第五章 两宋时期的思想体系	144
第一节 王安石新学思想	144
第二节 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49
第三节 关学与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	160
第四节 心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162
第五节 功利主义的反道学思想	165
第六节 佛教、道教思想的发展	169
第六章 元明两代的思想体系	175
第一节 道学危机	175

第二节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	181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思想	185
第四节	东林、复社的思想内涵	196
第五节	西学思想和自然科学思想	198
第六节	元明两代的宗教思想	204
第七章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思想体系	212
第一节	方以智的思想	212
第二节	王夫之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	216
第三节	道学危机的深化	221
第四节	功利主义的复兴	228
第五节	民主启蒙思想	232
第六节	惠栋和戴震的思想及其影响	237
第七节	史学思想	243
第八章	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250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潮	250
第二节	太平天国时期两种思想的对立	255
第三节	洋务派及其改革思潮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	260
第四节	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思潮	265
第五节	严复等的西学思想与旧学的较量	272
第六节	辛亥革命前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内涵	274
第七节	五四运动时的民主科学思想	283
后 记		291

第一章 原始社会与夏商时期的思想

我国历史始于商朝，殷商前的历史（包括思想史）并无直接文字记载，我们只能依先秦文字中的古传说、考古实物和晚期人类学调查去想象、揣测，加以重新拟构，故本章第一节就依据先秦文献中的古传说，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状况，从这些传说中揣测出原始社会人类之所思、之所想，总结出原始社会人类思维以自然宗教为主的主要原因。殷商时期，我国历史虽已有文字记载，但因文字少，且大多为甲骨文、钟鼎文，所以殷商思想体现的广深度十分有限，且历代学者对这些文字缺乏深入理解，所以，虽长期以来学界对殷商时期思想的认识和把握大多带有揣测和臆想的性质，但毕竟还是有了根据，基于此，第二节主要研究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夏商思想。

第一节 古代传说与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思想

原始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的漫长过程，依现代人类学家的观点，它大致可分为“未开化民族”“半开化民族”和“开化民族”三个阶段，其中任何两个不同阶段间的过渡期都很漫长。在人类刚脱离动物怀抱时，其生活、劳作情境与动物本身无多大区别，根本不具备“思想”的前提条件，这以《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中记载的“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和《礼记》中记载的“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骨，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为证，其思想无非是一些类似于动物本能的反映，始终超越不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等形而下的意味。但在“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艰难尝试过程中，原始人逐渐学会了使用火、石器和骨器，学会了驯服圈养动物，学会了建屋筑巢，认识了各种植物特性，才有企盼安居乐业之可能。同时，人们在生产劳作过程中学会了一些使用语言和符号沟通的技巧，这为原始部落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方便，也为记载其活动与思想提供了便利，为思想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脑力劳动者开始思考一些超越实际生活与生产、带有一定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认识问题，它们经过诸如图案、文字等符号处理后，成为我们思想史研究中的“思想”起源，这就是我国思想史的开端，后来像《礼记·礼运》《老子》《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韩非子》《鹖冠子》等古籍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模式皆起源于此。

如上文所示，人类自脱离动物母体后，慢慢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火等工具，以集体的智慧去获取自然界本已存在的物质生活资料，去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些集体行为中，原始人群逐渐以人为中心思考人的自身状态和变化规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思考就是人类思想史的最早萌芽。如在生产劳作中，日月升落和原始人所处空间的景物变迁引发原始人群对天象和时空变化的思考，由此产生

我国原始社会中晚期比较成熟的时空观——四面八方，这以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 1 号墓中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和 1987 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刻有四面八方、内方外圆图案的玉龟玉版为证。此外，汤家岗遗址中的白陶盘外底有八角星纹，岳阳坟山堡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八角形镂孔垫座、齐家文化铜镜、吴县澄湖良渚文化贯耳壶、殷商妇好墓的器物也都有八角星纹，它们均说明“八角星纹”所蕴含的天圆地方、四极八方、人居天地中心等思想已成为我国原始社会晚期普遍的空间观念。与此同时，人们还常根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和物象来确定方位和时间变化，表现为：①《尧典》中记载的“历正”神话。“历正”为华表的前身，而华表是我国原始人用来立杆测影以定四季、以定农时的图腾柱。赵宝沟文化遗址中的鸟龙与鹿龙图、野猪首牛角龙，鹿凤与蚌形图等“观象授时图”也说明我国原始人已采用不同手段去确定“农时”。②《上虞》《禹贡》《月令》《山海经》等著述中记载的“时宜”观和物候观察等其他方法。如凤鸟“司帝之百服”，犹今言四季变化披新绿。其他神木鲜花异草、秋棠而味如春李、夏葵而味如冬葱也均本于四时侧影，均有节令变化之寓意，已有宣夜说和盖天说的成分，成为我国律历制度和二进制、四进制、六进制、八进制和十二进制等数理逻辑产生的思想基础。原始人还以此为依据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辩证法思想，这具体体现在原始人的阴阳观和寰道思想中。他们普遍认为世间万物都在阴阳动态平衡的关系圈中循环运动，且由此产生“尚中”思想，这种“尚中”思想的文化体征为“史、王、主、中、巫、中国”等字词和前文所说的八角星纹，这种“尚中”思想为人类后来产生中央早于四方、中央优于四方、四方朝贡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原始人群在其时空观产生的同时，通过对各种动植物和土地的观察，也形成了其物性观。这种物性观的思想载体主要是远古神话，据《后汉书·蔡邕传》中的“(伯益)综声于鸟语”记载可知，伯益是了解禽兽语言的第一人，但此类记载中最典型者还应该是公冶长识鸟音。在《玉芝堂谈荟》中也记载许多动物神话，这足以说明动物神话的普遍性。虽然动物神话如此丰富，但是有关植物的原始神话在古文献中却极为稀少。依袁珂的“最原始的植物神话当具有：能言、会走；属于物活论范畴这两个条件”观点，这种诸如“洪荒时代，树木会走路”神话只存在于白族史诗中，实际上，在许多不见经传的民间传说中，也有诸如《中山狼》《天仙配》记载的老杏树诉说身世之苦、老槐树充当董永七仙女媒人等记载。实际上，这种植物记载的最初动机是怎样去保护和利用各种植物，这也是我国原始农业生态技术的开始，如《海外西经》记载肃慎国产“雄常(雒棠)”树：“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树生皮可衣也。”(郭璞注)《风俗通义》中的槃瓠神话说(原文见于《后汉书·南蛮传》)：“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在此“时宜”和“物宜”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对土地性质和肥力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注重选择土地种植作物，由此提出“土宜”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上虞》《禹贡》《月令》《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等著述中，成为它们的一个重要范畴。如我国远古神话中的颛顼神话就是最早的一例，其中“颛顼”的造字本意为“系高项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突出土地的作用，但其中的“土宜”思想并不明显。真正明确的“土宜”观最早体现在《汉武帝内传》中：“帝食桃，辄收其核，母问何为。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生。”这里明确指明“中土地薄，种之不生”，强调“仙桃”种植对土地的要求，强调人间食品的种植也需“厚土”。还有《洞冥记》卷三中记载：“有

掌中芥，叶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然后可移于地上。若不经掌中吹者，则不生也。”这里区分了“掌中”之土与普通之土所包含的地气和地力差别，说明育秧之土的要求与育苗之土的差异性。类似的记载还有《坚瓠余集》卷五转引于洪迈《夷坚志》的“葫芦枣”故事，但它比《汉武帝内传》所说之事更接近社会现实。

原始生态技术在原始社会农产品消费中也有所体现，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此时期已有古老的本草思想，例如，《瑯嬛记》引《贾子说林》说：“昔有人得安期大枣，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闻十里，死者生，病者起。”《洞冥记》介绍说：“陈有言吉云草，种于九景山中，二千岁一花。臣走往刈之以饲马，马食之不饥。”又如：《西次三经》中“其状如狸，一目而三尾”的灌（今通“欢”）；《北次二经》中“其状如乌，人面”的鸛鵒；《南山经》中“鸟首虺尾”的旋龟；《北山经》中“一首而十身”的何罗鱼和“状如鲤而鸡足”的鰪鱼。植物类的药方有：《西次四经》中崦嵫山“食之已瘳（瘳病）”的丹木；《中次七经》中少阴山“食之不愚”的萐草；《中次六经》阳华山“食之已虐”的苦辛（草）。《搜神记》的《郭璞救死马》，《山海经·五藏山经》中的各种动植物和药方记载均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动植物的特性和作用已有了深刻认识，为后人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因物性而种，因物性而食的生产、消费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原始人类在审视自然界的同时，也对人本身进行了自我审视，产生了浓厚的“尚阴”意识。依马克思的观点，人们的婚姻生殖观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大体可分为血缘婚、伙婚、对偶婚、单婚时代，相应出现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家庭。这几种婚姻家庭形式可以使我们领略到原始人的自我审视思想。在原始群团中，最先是纯动物似的乱交、乱婚时代，直到对偶婚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存在母权至上、平等和谐的“尚阴”思想。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我国古汉字具有明显的“尚阴”思想，例如安、女、阴等。史前文化中的许多宽臀、丰乳、隆腹的女性雕像也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如在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中最早发现了这种远古时期的女性雕塑，它们反映了当时普遍崇拜女神以求子孙昌盛的思想轨迹。这种“尚阴”思想还体现在远古时期许多女神神话故事中，女娲补天、洛水女神宓妃、精卫填海、巫山云雨、娥皇和女英、九天玄女、后土、斗姆元君、太阳神羲和、月亮神常羲等；指陈男女交合隐喻性代码的“巫山神女”是女巫、催情草及其媚术的三位一体，其使命是用药草和仪式制造情色氛围，促进部落男女交媾、生殖和繁衍，因此，她叠印着楚民族祖先女神的模糊原型。总之，这种“尚阴”思想起源于女性在人类社会早期为人类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人类早期对生命脆弱的认识，对生老病死的迷惑，对生命健康和子孙昌盛的渴望。随之而起的生殖崇拜十分普遍和流行，图腾崇拜大多与生命现象有关，“生育图腾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阶级产生以后，社会出现不平等现象，“尚阴”思想转而代表了人们对公平、平等、民主、和谐社会的渴望。

人类思维诞生后，就存在唯物和唯心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在古代科技和人们认识能力落后的情况下，唯心主义思潮总凌驾于各种唯物主义思想之上，因为原始人类刚从动物分离出来时，既依赖于自然，又受到自然的严重束缚，在制造和使用简单工具进行集体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只能进行简单思维，后人便把这种简单的思维称之为原始思维或神话思维。它认为：万物有灵，物我趋同，物我之间有一种神奇力量使之互动，这为原始人的自然宗

教思想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由血缘群体内婚制转向血缘群体之间的外婚制所形成的氏族制社会是原始人的自然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一般来说，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崇拜内涵和崇拜行为主要包括对物我之间所存在的超自然力量的自然崇拜和对超人间的氏族祖先崇拜，当然，这种崇拜行为在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中的表现和思想内涵均有不同：在开始于太皞氏、一直延伸到颛顼的母系氏族社会里，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在农业创生不久后为了纪念农业创生、禳灾、祈年而举行的腊祭、燔祭等，用雩、雩、雩、酺等办法来应对水旱疾疫，当时的始祖崇拜主要表现为半人半图腾的女始祖崇拜，因为当时人们普遍将祖先和自然物混为一体。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祖先崇拜成为一种宗法性内涵很强的正统宗教，其核心内容为“崇天敬祖”，其表现为祭拜男性祖先为主。自然崇拜则以“灵性”崇拜为主，从灵物崇拜发展为精灵崇拜和神灵崇拜，每一种崇拜物后面都有一种“灵性力量”的思想出发点。从这些祭拜对象和墓葬情况看，当时宗教崇拜对象的确定以是否为部落作出突出贡献为标准。为了生产和生殖而产生的祖先崇拜是如此，作为一切宗教起源的图腾崇拜更是如此，“图腾既是神的象征，又是社会的象征，神和社会本质上只是同一个东西”。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普遍存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民主平等的社会理念，凡部落成员均有权参与祭拜，均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妥善安葬，但这种理念因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随之出现而使之消亡。家庭、氏族群体、部落之间的经济、社会实力差距与日俱增，原始时代的平等关系被打破，形成了氏族长老、部落酋长和世袭氏族贵族等特权阶级与平民、皂隶和战俘等下层阶级的对立，这种社会对立反映到原始宗教里，便使神谱中出现了地域保护神、神灵等级化，这以《左传·昭公十七年》中郯子的少皞诸官名为证。这诸官图说明“凤鸟氏等皆系图腾团，团而兼充官职，这正是政权差等化的现象。以前各团皆平等，无所谓尊卑，迨后政权逐渐集中而且差等化”。祭祀的主持人和把持者也因此成为了特权等级人物，出现了巫师、寺庙及其祭司等宗教专职者，也就成为特权阶级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者。依金景方之言：“巫、覡实即为中国原始社会时代的魔法师，在当时社会中确占据有势力的地位”，这些人的出现和神谱的等级化，说明了统治阶级力图借助宗教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例如，神圣的王权就来自于巫师、巫医，出现了首领祭祀和首领崇拜，出现了专门的祭祀场所和设施。但正是由于这些祭司、巫师、巫医、巫祝的出现，才有可能制定一系列神谱、制定出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和规则，制定出确认社会的等级化和规则化，从而开始真正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也随之开始人类思想史，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宗教成分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

第二节 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的夏商思想

一、夏朝的科技与宗教思想

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我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据目前的历史著述来看，史家因可信的资料甚少而只对其进行略论，或者干脆避而不谈，就像葛兆光所说：“考古发现无法确定，历史文献也不足征，只好暂时放在一旁。”侯外庐也说：“关于夏

代，因为迄今发现的直接史料较少，还不能做确定的研究。”张岂之说：“夏史的可靠文献资料很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主要叙述夏立国以前禹治水的事迹，禹即位至桀亡国这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从这些名家之言来看，关于夏代的思想研究确有一定难度，本书也只能根据不多的资料予以浅谈。

夏本是居于夏地的一个部落联盟。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夏地在今河南禹县，或说今汉水流域，或说今山西夏县。自禹登基传至桀，共传17君、14世，历时400—500年。其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其领土范围大致东起豫东平原，西至华山，北起济水，南达淮河。

大规模农业的出现、手工业的兴起、青铜工具的使用、城市和宫殿的形成，说明了人们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禹臣仪狄开始酿酒，少康酿造秫酒，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部落，《尚书·禹贡》中有“莱夷作牧”的记载，《夏小正》中最早记载我国的栽桑养蚕技术，提到过“五月、启灌蓼蓝”的蓝草种植和染色技术，也提到“颁马”（将受孕的母马与公马分开饲养），“纲恶马”（淘汰劣马的技术），“执陟”（用成熟强壮的公母马交配）和“攻驹”（给马去势技术），这些都是我国原始人群初等畜牧技术经验提高的表现。

随着技术进步，科学也逐渐产生。此时的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夏时》中，经历代学者考证，《夏时》内存夏代资料，原文收入《大戴礼记》中，但它在唐宋时期散佚。现存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著《夏小正传》，不仅包含原来之全部篇章，且汇集当时所藏两个版本之文稿而成。全文四百多字，由“经”和“传”组成，其内容以一年十二个月为序，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生产等方面信息和相关重大政事，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内容有：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其中，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其中马的阉割、染料的蓝和园艺作物的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历史上的首次记载。所以，《夏小正》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本天文历法、物候学等实用性科学书籍，其性质同于后来的《月令》。从夏代后期的孔甲、胤甲、履癸等几个帝王的名称来看，当时已经掌握了天干纪日法，有了十天为一旬的概念。从夏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的传说来看，准绳规矩已作为测量工具用于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传说夏禹制造有山川、草木和禽兽图的九鼎，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地理知识。但此书在当时还兼具极浓厚的政治意义和宗教活动指导色彩，与后世所谓的“朔正”具有相同性质，为当时的统治阶级进行宗教祭祀活动提供时间和气候指导，它既是科学的，也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

夏朝建立后，统治者通过其宗教制度的改革对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的组织制度进行改革、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强调其严格的等级差别，并将其制度化。首先，在夏灭诸部落时，将宗教视为一种精神统一的工具，不仅改变诸部落的政权，而且改变诸部落的宗教，以实现对各部落的精神控制。后来的商汤灭夏时看到了这种宗教改革的巨大力量，也故伎重演。其次，夏朝政权稳定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所拜神灵等级化，夏朝所祭拜的社神和山川神，均有地域性，并有等级之分，社神最早是地位最高的地方神，“社稷”一词因此成为国家的代称，后来，在社神之上又产生一种全国通祭的最高神——天，或上帝。上帝或天的概念在唐尧时就已出现，故古文献中述尧时，常提及天，如在《泰伯篇》中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但并未享有很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到夏朝时，夏朝统治者在神灵等级化方面下大力气，天或上帝的政治和宗教地位遂完全确立，其主要目的是借神灵等级制度来确立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维护自己的统治。如夏征有扈

时作《甘誓》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再次，夏统治者还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只能祭拜相应级别的神灵，决不能越级、越地区祭拜，以此来加强对被压迫、被剥削人们的统治。最后，从《夏时》所记载的资料来看，古时的王、诸侯等既是宗教代表，又是政治代表，当时的巫史宗祝既是宗教家，也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是对人们实行精神统治的主要力量，巫史宗祝和王、天子、诸侯等合而为一，披着宗教的神秘外衣行使其政权，使人们对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心悦诚服。

二、商朝的科技、哲学思想

商朝是商汤剿灭夏桀后建立的又一个奴隶制国家，自商汤到商纣王自焚灭国，历经 31 王、17 世，共 600 多年时间。在这 600 多年时间里，农业、青铜、陶瓷等生产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其科技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天文、数学、医学、农学、物候等思想体系继续保持感性认识的方法，积累和整理原始经验。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阴阳、五行、八卦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也逐步产生，理性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但因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限制，此时的理性认识水平仍相当低下，神秘主义、宗教思潮仍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统治的一种主要思想工具。

商朝时期，青铜工具、马车及其配件制造等手工业虽然已经产生，但当时的生产仍承继着原始社会集体协作的遗风，常常进行大规模集体劳动。只是在这集体协作中，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进行，体力和脑力分工逐步明显，此时已经产生了王、尹、卿士、小臣、司工等官吏名称，商业也产生了。专门从事宗教、文化事业的占、巫、卜、史、士等脑力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因此，我国的汉字造字体系已正式形成，例如象形和指事都属于独体造字法；形声、会意属于合体造字法，其抽象含义比较明显；转注、假借属于用字法。我国的六种造字法起源很早，可以说它们是我国先民感性思维的结果，这几种造字法所造之字虽然总体上比较复杂，但个体上则类似于具体事物的实体，可能和母系氏族时就已存在的结绳记事、图形等符号化有关，是属于“作为一种画面的仅仅容许有限概括和初步的抽象的，丰富而具体的语词”。商朝对文字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繁杂的图画转变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简便的书写和记事符号，并刻于甲骨和青铜器之上，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这两种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的抽象化水平明显提高，就像郭宝钧说“形声的方法已成为金文时期独占优势惯走的道路”，这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摆脱了“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的象形时代。

商朝时期，人们的抽象思维水平虽然明显提高，但他们在对自然界及其物质特性认识过程中还是继续发扬经验性思维的优势，如人们在储藏粮食过程中，发现粮食或食物因潮湿而发酵，产生糖化或酒精，于是制糖和酿酒因此产生。在石器、陶器制作过程中逐步认识铜的本质，也积累了丰富的烧制冶炼经验，贮备了耐火高温材料和造型材料的技术，以至于烧制温度能达到铜的熔点。不仅如此，当时人们还思考了合金成分、性能、特性和用途，掌握了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合金“六齐（剂）”规律，《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因此，人们能在铜和青铜冶炼过程中生产出青铜器，结束石器时代，步入金属时代，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快速提高。商朝时期的农业和畜牧业快速发

展，采取“熟荒耕作制”，积累了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农作物选种、田间管理、园圃经营、栽桑养蚕和畜牧畜医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人们已依据动植物特性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了分类，使用圈养等驯服方法，产生了四季灭草和施用粪肥和绿肥恢复土壤肥力的思想。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已开始注重对日食、月食等星象和风云雨雪等天象进行观察，已对一日进行了不同时段划分，且采用干支记日法、大小月相间纪年法，并且具有了年终置闰法这一阴阳合历中的最大特点，同时还发现了地壳的运动变化属性，在甲骨文和陶文中，已有五百个地名和一些方位名词。从甲骨文和陶文的记载看，商朝已有了详细的计数法，具备了现在的所有数字符号，已有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算筹已经开始使用，遵循十进制运算。甲骨文的卜辞中还记载五百种疾病和人体的各部位，对病因也有一定程度的探讨，认为人的疾病乃天帝和祖先所降、鬼神崇祸、妖邪之蛊惑或气候影响，因此，采取宗教仪式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一时期，在食物的烹调过程中已产生一定程度的医药学思想，例如伊尹使用汤药的记载就是一例。

在下层百姓从日常生产和生活行为中总结出各种具体科学思想的同时，因科技水平低下导致的宗教迷信思想仍十分盛行。殷商统治者已将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力量秩序化，出现了地方神和最高神的划分，帝的地位最高，天地四方神各管一方，有完整的空间秩序观念，由此产生等级极为森严的神谱和祭祀权力，把与上天主宰者的关系逐渐集中到王一人身上，但同时又实施具有明显母权制度残余的“殷道亲亲”制度。在王的周围形成了一批既把握祭祀大权，又有知识与技术，并代行王权，以思想为职业的巫觋和史官，他们把握外部世界的星占历算之学、整顿人间秩序的祭祀仪轨之学。奴隶主贵族十分重视农作物种植和收成，经常举行农业宗教仪式，卜问农业生产收成，占卜疾病能否治愈，巫在疾病治愈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据记载，当时的十巫除了主持便于人和神沟通，以祈疾病痊愈的占卜和祭祀祝祷活动外，他们还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用药物治病，可见“当时的医和巫、治疗与迷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不可分开的”。且在祭祀过程中将祭祀程序秩序化，将祖灵崇拜与王权结合产生的观念秩序化，重视对祖先和子嗣的关注，墓葬、宗庙、祠堂、祭祀成为肯定和强化生命意义的庄严场合，且通过对群组以降身、献腥、馈食、祝册等程序进行翌、膺、乡等三类五种祭祀活动（既祭祀先公先王等直系男性祖先，又祭祀先妣以及先公先王的诸兄弟）的方式形成一种家族、社会、天下为一体的家国同治宗法制度，使之成为“后世宗教性礼仪的源头，也是区分血缘等级秩序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方法”。

商朝思想体系的最高思辨水平集中表现在《坤乾》和《洪范》这两本哲学著作中，它们具有非常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坤乾》乃孔子得之于宋，是其观殷道的重要书籍，据《礼记·礼运》记载“吾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该书既是哲学著作，又是卜筮之书，是后来《周易》的重要来源，这以孔疏引熊氏之语“《归藏》以《坤》为首，故先坤后乾”和贾疏“此《归藏》以纯坤为首”和黄以周所言“《归藏》首《坤》，即《说卦传》坤以藏之之义”为证。由此看来《坤乾》就是《归藏》，是《周易》的直接理论来源。故不难发现《坤乾》是一部极具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因书中已初步提出了寰道、阴阳观念、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物极必反等辩证思想。《坤乾》首言坤，这是我国母系氏族中母权社会的遗风，说明当时社会氏族制度依然存在，与当时殷王

提倡“殷道亲亲”的家族、社会、天下为一体的家国同治宗法制度一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理念。

与《坤乾》性质相同的哲学著作《洪范》，不仅思辨性理论水平较高，而且极具可操作性，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整体性思维的典型代表。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视为整体，在初步分析、分类和综合基础上进行抽象与概括，阐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书中记载了殷商旧臣箕子应对周武王访问所阐述的“九畴”思想：（1）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简单认为世界由五种简单的物质元素构成，同时，又简述它们的性质，并将它们的性质和功用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2）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晰，聪作谋，睿作圣。”此五事仅就人的思维而论，对人的思维的基本要求做出一个基本规定，我国后来几千年的思想史中，人们的思维就局限在这几个字中。（3）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它专言社会所应关注农用之事，社会和国家治理如是而行。（4）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简论时间变化之理，要求人之行为与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5）皇极：阐明王道，即树立皇极威信，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之基本原则和标准：“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6）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巽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规定和解释了为人之基本品德。（7）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这是我国古代运用算筹决策的语言痕迹，介绍将龟甲、蓍草等占卜信息与卿士、众民和占卜者的意见相结合做出相应判断和决定的方法。（8）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庠。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关注农业生产的语言文字体现，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既是我国传统天象学、气象学和物候学经验的总结，也为我国后来的气象学和物候学奠定了基础。（9）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0）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实际上第九和第十是紧密相关的，它们是从正

反两方面的角度劝导人们弃恶从善，故而合称为一筹。第九通过寿、富、康宁、亲近有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向善，第十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门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洪范》的主旨在于论述天的“彝伦”，即天之复育下民的美德。王乃天子，是皇极，皇极之言“无党无偏”“无反无侧”，臣民必须服从，服从者可得“五福”，违背者则受“六极”之祸，这是一种典型的天命论。后来，人们将它与历数、卜筮占候紧密结合，发展成为各种迷信的理论基础。